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5.005

在音乐教育中实现美育

——从蔡元培、萧友梅、贺绿汀说开去

徐科锐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 中国现代美育的发展史,凝结着美学史和艺术史的重构,是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许多关心美育和艺术教育的美学家和艺术家以不问中西的姿态,吸收一切有益的因素,建构中国特色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历程;历史中的那些志同道合的美育敬重者,从美育观念的更新、美育机构的建立、美育人才培养体系的谋划,以及身体力行的美育和艺术教育实践入手,致力于现代艺术教育和美育启蒙;这其中贡献突出的艺术家贺绿汀承继着历史的积淀,以人民至上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立场,一以贯之地传播着现代美育观念和思想,以为党和国家服务为使命展开了行之有效的美育和艺术教育实践。这一切对今天的美育事业深有启示。

[关键词] 中国近代美育;蔡元培;萧友梅;贺绿汀;艺术教育;美育启蒙

[中图分类号] J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9)05-0029-07

音乐是人类反抗噪声的行动及其结果,是人为了自己的心灵健康创造声音环境的另一种可能,所以有人说“对于充实而又快乐的人生来说,音乐是不可或缺的。”^{[1]200} 尽管在审美教育中,绘画、雕塑、舞蹈、戏剧,甚至包括文学等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电子音乐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音乐的制作、复制和播放空前便捷,传统的音乐传播和音乐教育方式与电媒时代音乐接受的普适性,为以音乐艺术实现审美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音乐教育成为艺术教育或美育的独特而重要的途径。讲究人格教化的孔子、荀子、庄子对音乐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发达,都说明在人格教育里音乐教育于中国传统中被重视的程度。进入 20 世纪,包括音乐在内的中西艺术、中西美学和美育思想渐次在中国出现汇流,一些现代美育的主张者和实践者,一些音乐家也开始了理解和传播新音乐,开始以新的艺术进行艺术教育或审美教育,蔡元培、萧友梅、黄自、贺绿汀算是中国这段历史时期审美教育的

先驱者。贺绿汀是其中最具有成就和影响的音乐教育家之一,他从 20 纪之初的青年时代到新中国时期,一直为国家的音乐教育和普及艺术教育做着非凡的努力。当我们以考察和探索的心态进入他的艺术教育人生历程时,不仅能够体悟到一位音乐家的魅力和风采,还会获得对今天的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深刻启示。作为 20 世纪杰出的音乐教育家贺绿汀,生于 1903 年,恰逢中国近代美育之路的形成之初,其一生的教育思想和价值观中凝结着中国“美育”的进步基因,其一生的伟大举措在传承和践行着美育事业,并于现当代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当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贺绿汀用自己的音乐人生参与了从近代“美育”的提出到新中国“美育”的发展,以音乐教育为主要途径,践履着“美育”在中国音乐教育领域不同时期的实现、转型及价值释放。

一、不问中西:现代性美育观念的探索与建构

进入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美育渐渐成

[收稿日期] 2019-05-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YJA760043);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8B157)。

[作者简介] 徐科锐,女,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博士,吉林省政府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首批科研春苗人才。

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诉求。尽管那时,美育事业在中国社会尚未被全社会重视,但中国丰富的历史传承的力量、时代文化和教育的需要,使得许多有识之士于世纪之初就开始了他们的研究、探索和实践。

在近代中国美育的发展历程中,梁启超、康有为、鲁迅、朱谦之、梁漱溟、冯友兰、王国维、蔡元培等人都对美育从哲学、文化以及教育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认识和觉悟体现了对现实的反思和对理性地召唤、对美与艺术的本质关系和美育与社会关系的积极探索。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就现实意义而言,美育事业显示出时代对它的需要,例如这一时期掀起的新音乐思潮、音乐艺术的历史性更名,都体现了现代性进入中国社会后艺术史学观念的重塑。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这幅宏大的历史现场极为活跃,但都未曾偏离一个声音,那就是借助艺术实现美育从而寻求一条救国的路线。从蔡元培、萧友梅、黄自再到贺绿汀,我们发现了音乐教育的美育意义实质上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力量之一,是文化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时代举措。这得益于蔡元培等人的科学眼光、思想深度和对现实的准确把握,这一战略选择被贺绿汀等人传承下来,为新中国的美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国音乐的历史转型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它的身份和存在属性也随时代的演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音乐思潮、音乐形态、音乐教育和音乐风尚都由传统转向了现代,同时文学艺术、美育思潮、国家文化之间的交叉互动也成为一种事实,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文明的进展。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潮和新音乐文化属性当中包容了许多的争鸣,我们在回顾历史中能够清晰地发现曾经的是非恩怨反倒是在促进艺术和艺术教育生态环境的调整,时代的差异没有削弱对真理追求的热情,新的美育观念被理所当然地逐渐展开和传承着。在与西方先进理念的融合中,美育理论与音乐形态都实现了适应本土的中国化特征。触动这一时期产生质变的有多方面力量,蔡元培在宗教与美育之间洞察到的微妙思想建构为那个时代一面审美教育的旗帜。那一时期落后的音乐教育、音乐思潮乃至国人的落后观念并不能一概而论为阻止时代进程;相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量化着彼此之间的递进关系和共同面向。从北京大学到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这一路记录着蔡元培与萧友梅翻开上海

音乐学院史第一页的努力,“美育之光铺洒创业路”映入眼帘,这所不寻常的音乐学院的前世今生中,演绎着一条从近代通往现当代的康庄大道。

1920年,留法归来的萧友梅博士,正式参与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建设中来。1922年3月25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七次会议,蔡元培以便条手书这一提案,通过了《北京大学学生事业委员会成员提案》,萧友梅在计画股负责音乐科目,与其他同仁——燕树堂、陈衡恪、马寅初等有义务、有组织地管理学生社团及开展相应的公益事业。是年6月24日,蔡元培与萧友梅商议成立传习所事宜,其前身是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的整体建设,体现了蔡元培对美育教育的深入思考。此外,在蔡元培的治学理念中,学术研究的传播要建立相应的理论阵地,于是,《北京大学季刊》于1922年8月1日创办,冯汉书担任自然科学组主任,王雪艇任社会科学组主任,胡适之任国学组主任,蔡子民(蔡元培)任文艺组主任,萧友梅为文艺组委员,这一季刊成为美育理论的阵地和美育社会传播的最佳途径^{[2]572-664}。从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思潮来看,当系统而又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尚未成熟之际,蔡元培已将审美教育具体落实到北京大学里,在1922年10月2日的开学典礼中如是说:“科学的研究,固是本校的宗旨;而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今年该由学校组织分作两部:(一)音乐传习所,请萧友梅先生主持……除规定课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乐演奏会与美术展览会,以引起同学审美的兴味。”^{[2]769}事实上,蔡元培与萧友梅的结缘,乃至贺绿汀一生为之殚精竭虑的国立音乐院的建立,都不是偶然的。1920年3月,萧友梅归国,他说:“我这回从德国回来,路过美国的时候,听见有人说北京大学有一个音乐研究会,心中已经很喜欢;到了北京,不过几天,蔡先生就送我一本《音乐杂志》,我更喜出望外了”^{[3]143}。这种结缘,深层地体现了二人有着同样的价值观。那时的萧友梅极具开阔的视野,抱有热忱的音乐情怀深入到音乐教育之中去,并怀有客观批判和包容的态度。他曾在《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3]143}中,针砭时弊地指出了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种种原因,洞悉了20世纪初中国音乐落后的根源。随后8月21日,他借《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萧友梅先生教育演讲》(在高师实验小学研究

会)》^{[3]153},9月7日发表了《实验小学之教授法及教材》^{[3]160},这三篇文章系列化地提出对美育教育的初步看法。在第一篇中,他指出在中国音乐落后时期受教群体的年龄启蒙问题。第二篇则是依据启蒙提出了建设性的想法,在第三篇文章中直指儿童美感塑造的要义,他分别就“儿童本身”“教室”“儿童的家庭”“春天”“夏天”“秋天”“水与冬天”以及“人”等关键词谈到了如何塑造儿童认识世界的美感价值观问题。从哲学角度阐述“人”对于现象的把握要还原到认识层面的逻辑问题。这三篇文章是萧友梅深入思考中国近代美育与教育实施的重要文献,这不仅奠定了他个人美育价值观的基础,而且确立了对日后贺绿汀受教的国立音专的培养定位。

在1920—1927国立音乐院成立的过程中,萧友梅在北京大学发表的系列文章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至于在后来的音乐文化思潮中都成为核心论点,他1920年发表的《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一文,从表面上看是单纯地介绍中国与西方的教学方式、乐谱、音阶、译谱等,实则强调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的先进性,与他之前发表的《美国哈佛大学音乐学的课程》一文有同样的指向性。“中西问题”一直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音乐争论的重要问题,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了类似问题的回流期。从当时来看,作为这一思潮的参与者,他清楚,要发展中国的先进音乐,必须有现代的音乐教育机构,内心活跃着创办音乐院校的个人渴望。这一时期,他在北大教学的工作经历,恰好加速了他的理想走向现实的进程,这也验证了他与蔡元培办学治校上的志同道合,他们要建立一个借助西方先进的作曲技术理论的成熟的中国新音乐教学阵地,他在自己19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这样的理想:“除了推广一般的科学与技术之外,还应该更多地注意音乐的,特别是系统的理论和作曲学在中国的人才的培养”^{[4]133}。回国以后,他认为“我们中国已经一千多年没有办过一间学校了”“以及音乐同唱歌与美育很有关系……”,他与蔡元培的“志”均体现了以教育为手段的目的,而以教育为手段去实现美育和艺术教育实则是他与蔡元培的“合”。可见,后期的20世纪音乐思潮中,认为音乐教育落后的一些音乐志士所提出的改革和实践,以及贺绿汀青年时期就读的国立音专的培养定位,他个人在世界作曲比赛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承袭了这一重要的理念。萧友梅也没有辜

负蔡元培对他的期许:“萧先生注重音乐的技术,而以学校为传播的机关,所以回国后,即在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等校设音乐研究会,后来在上海办理音乐专科学校,无论有何等艰难与辛苦,他终锲而不舍。”^{[5]284}

纵观20世纪之初,蔡元培从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始,慢慢地与文人志士共同营造了一个空前盛大的美育氛围,美育方面的果实,体现了美育理想的现实转位。蔡元培在其《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回顾并展示了这样一幅全景式的图画,这幅图画是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学术性、美学性、丰富性与中国性的,涉及的美育范畴有造型美术、音乐、文学、演剧、影戏、留声机与无线电播音机和公园,地点分布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先后成立的学校和美育机构,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中国画学研究会、故宫博物院、国立音乐院等。在这一历史时期,《音乐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与审美教育有关的现代纸媒也相继问世,一批艺术家、作家和翻译家如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黄振玉、刘半农、萧友梅、刘天华、胡适、陈独秀、鲁迅、茅盾、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田汉、梅兰芳……^{[6]79-93}等也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审美教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兴趣,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显示出一定的乐观前景。

二、志同道合:致力于现代艺术教育和美育启蒙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之中,1927年11月27日,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蔡元培、林风眠、王代之、杨铨、高鲁、周峻、李金发、吕彦直、萧友梅等人。创办国立艺术大学的实质性意义是真正使美育走向了专业化之路,对此,蔡元培做了这样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阐述:“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是故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我国民政府为励行革命教育计,有不可不注意富有革命性之艺术教育,急谋所以振兴之。……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教育当务之急,应在长江流域设一国立艺术大学,以资补救,而便提倡。此本会向中华民国大学院建议创办国

立艺术大学之最大理由也。”^{[7]133}

萧友梅继承蔡元培的美育主张,开启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学府的大门。从萧友梅的美育价值观来看,国立音专的办学定位和教育思想是高瞻远瞩的——“本院为国立音乐教育机关,目的在养成音乐专门人才,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而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志及其艺术。本院分预科、本科、专修科、研究科及各项选科”^{[8]23}。这一办学定位是解决中国音乐教育落后现状的有效之举,这一举措并不是理想化的,而是基于萧友梅多年的实践经历做出的现实性选择。这些想法在其之前的某些论文及演讲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特别重视对于青年和儿童的音乐教育,而科目的丰富性,则是关顾到战乱以及教育现状和参差不齐的年龄结构问题,恰恰是这种科目的丰富性使得课程设置较为科学化,同时,也恰恰是因为人才培养年龄上的包容性,才使得而立之年的贺绿汀能够走入国立音专。

1929年10月,萧友梅聘任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黄自来校任教,此人对贺绿汀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进入国立音专之前,贺绿汀已经开始守望着自己虽执迷但却不系统的音乐价值观,正是在黄自的教导之下,才使贺绿汀能够系统地掌握真正的新音乐核心理念,并获得世界音乐大奖。这不仅验证了贺绿汀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与努力,更体现了国立音专先进的教学。从历史价值上看,他们的成就使中国新音乐思潮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美育历史的画卷中掺杂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如同萧友梅当年与蔡元培在北大的作为,年轻的黄自与萧友梅在上海致力于国立音专的建设,而贺绿汀受教于恩师黄自,到后来接续萧友梅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这里虽存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这必然当中有更多感人肺腑的过往,年轻的黄自在受聘国立音乐作曲教学之时,教授11门课程,均以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为主。在贺绿汀翻译那本《和声学理论与实用》,黄自经常鼓励他说:“希望你锲而不舍,译完全书”^{[9]2}。随着贺绿汀在作曲技术理论上的成熟,他逐渐与黄自参与到左翼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去,黄自经常如是说:“我们要发展自己的音乐,绝不是抄袭外国作品,它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10]13}。黄自的一生虽较为短暂,但是成就卓越,他为新中国培养了一代抒写

历史的作曲家们。在音乐思潮中,黄自几经受到诘问,当然这都是有关“中西问题”引发的,实际上,他承袭了蔡元培、萧友梅美育观念和思考,在教学理念和极具民族情怀的立场上尤为坚定。抗战爆发后,贺绿汀与恩师话别,他曾这样感慨道:“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得自黄今吾先生循循指教……所以,他可称是我最大的恩师,是将来的路程的指导者。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0]10}从这样一条主线来看,如果说蔡元培奠定了国立音专的“美育”基础,萧友梅是国立音专的“美育”开拓者,黄自则是“美育”的传道人,而贺绿汀是直接的受益者。贺绿汀在成长的道路上,更不可缺少一位同盟,也是对他后期致力于国立音专建设和他个人对于美育教育 and 专业教育理念成长成熟的重要影响者,他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

在国人几经论证“美育”实现的时刻,在人们刚刚品尝甜美的“美育”果实之际,“美育”在外敌的侵略下遭受了重创。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上半叶,“美育之光”却如星星之火遍及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重庆育才学校是一所难童学校,贺绿汀应邀积极投身到音乐组的教学与建设中。在高举教育救国的旗帜下,育才学校的培养定位任重而道远。在革命的岁月中,陶行知的“行知行论”与毛泽东的“实践论”极度吻合,放眼于国家的未来,只有儿童能够担负此重任。陶行知认为:“学校对于孩子品格的形成肩负的义务就是限制、重塑、劝导、加强、丰富与发展他们的各种本能,以便他们能以一种和谐和上进的方式适应社会环境,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认识孩子的天性,必须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必须提供给他们实际参与的机会。根据其发展阶段,孩子必须被引导去接触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包括贫病以及经受磨难”^{[11]20-22}。在关注儿童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这一伟大的教育家也曾阐述自己的美育观点——“生活即教育”。在育才学校的三年之中,贺绿汀初步形成了自己对美育的认识,他在1940年发表了《音乐组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文中说:“一个艺术家不单对自己的一门有深切的研究,对其他艺术科学、哲学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都应有深切的体验与认识,否则就是一个‘艺术匠人’而不是艺术家。”^{[12]69}从这篇文章中已经显现了贺绿汀对于专业音乐教育之外关于美育层面的思考,贺绿汀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自然而然地建立了人生重要的价值取向,在育才学校的经

历,可谓是萌发了其后期在新中国各大艺术院校采纳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体制,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在世界上有名的专业音乐人才。贺绿汀一直走在抗战、救国、创作、教学和传播美育的前沿,他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美育在当代的传承者,也是重要的领航人。

三、人民至上:贺绿汀一以贯之的美育观及其艺术教育实践

在贺绿汀的美育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倾向,一个是人民至上,一个是为美育而教育。

他的《牧童短笛》,左翼时期的电影音乐作品,抗战时期的《游击队歌》《嘉陵江上》《保家乡》《谁敢夺我一寸土》等充分体现了他博大的人民性倾向和高度的爱国情怀。他曾说:“音乐工作者必须和人民相结合,必须把自己的创作扎根在人民生活的深处。因为音乐本来就是人民的创造,音乐工作者如果脱离了人民,他在创作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前途。音乐越有民族特点,就越为人民所欢迎。”^{[13]51} 那首耳熟能详的《游击队歌》在抗战时期被战士们抄写传唱,直到 80 年代,贺绿汀去广西南宁的时候,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英雄握着贺绿汀的手说:“我参加革命很早,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喜欢唱歌……几十年过去了,唱过的歌也不知道多少,可是只有两首歌记得最牢,一首是《国际歌》,还有一首就是贺老的《游击队歌》。”^{[14]37} 一个成熟的音乐家心中有人民,必然在实践当中真正地关切人民。

1949 年 12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而音乐教育必须要与国家战略思想保持一致。此时身为全国音协副主席的贺绿汀意识到,当下任务不仅仅是对上海音乐学院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与国家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是要推进教育的各项事业。于是他将“一以贯之”的美育思想与国家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认为教育应该承担着顺应时代的任务,同时也应特别关切审美教育的时代性。这也是他对先前教育思想的发展,他早在育才学校时就说:“我们不单要培养他们成为专门人才,而且要成为坚强的工作干部,使他们在抗战建国的路程中发挥伟大的力量。”^{[12]69}

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有异有同的贺绿汀,在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中,提出“为美育而教育”的主张。他在 1949 年说过:“我认为提高音乐工作干部的水平最为迫切,许多长期在文艺

工作团体中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他们有长期的丰富的工作经验,长期的在群众中的生活体验,假如有一个这样的音乐学校,能经常轮流调集他们做一年或者半年专门的业务学习,那对普及与提高两方面都可以起很大的作用。”^{[12]95} 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看,贺绿汀充分认识到音乐管理人才的重要性。20 世纪 50 年代之初,上海音乐学院就设立了培养音乐干部的专修班,这些人员分别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团体、院校,部队歌舞团,形成了新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个具有普及性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当然,面对极为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认为,“过去对于这些中国固有的音乐家和他们的艺术内容的改造是有过一些成绩的,但还是不够得很;假如我们有计划地加以全面的改造,使之能直接参加新民主社会的文化教育建设事业,一定是一批很强大的生力军……我认为抛开了他们而去空喊建设新的中国民族音乐,那是不可想象的。”^{[12]95} 贺绿汀的美育思想中,始终将专业性与普及性并举,构成互为依托、互为促动的格局,而且强调“普及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专业性”,是“专业性”的根本所在。这显然是一种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主张。

贺绿汀在“文革”之前那段平稳的弥足珍贵的时光中,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开始了自己的创新之路。1951 年,他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呈请准予于本年秋季恢复少年班事”^{[12]109}。1954 年,他在给中央文化部的报告中提到了全国的音乐教育面临的问题:“中小学音乐教育匮乏,音乐专业学校几乎没有,大学音乐教育极为困难,建议中央教育部应初步建立明确的音乐教育制度。”^{[12]128} 在新中国初年百废待兴的情形之下,贺绿汀首先明确的是教育的任务应承载着新中国的新使命,音乐教育要尽快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必须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才有可能遵循音乐发展规律,进行顺应时代的某种尝试性的改革。实际上,贺绿汀的伟大之处是让国际上也甚为钦佩的“大中小一条龙”的艺术教育模式,这一艺术人才培养的战略性思路,即便放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也还具有适用性。这一思想源自 1939 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13]144},贺绿汀直接将他付诸具体实践并不断完善。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地方各大专院校都采纳了这一做法,不仅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学科奠基人,而且也为普及性音乐教育提供了一定

基础,扩大了专业受教人才的范围。

贺绿汀的音乐教育思想尚有其他表现:首先,是他的“三维四段式”的音乐培养模式,“三维”即音乐人才应按“音乐艺术人才、音乐教师人才和音乐管理人才”三个维度进行培养;“四段”即在培养的过程中应该做到“目标明确、方法得当、专业扎实、综合提升”。这里,贺绿汀是专门指向专业音乐教育人才方面。其次,贺绿汀认为实现音乐教育方式的“合理转换”还应该做到“三个结合”,即在美育教育与德智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音乐研究与教学实践三个方面做好“有机结合”,实现“合理转换”^{[15]135-139}。这一观点,是贺绿汀对美育的重要思考。他把专业训练、人的认识、社会关系和美感体验都化为一个整体,以专业训练为剖面,横向上弥补专业训练中人的素质训练的缺位,纵向上把整个社会人们精神追求的塑造指向了德育培养。贺绿汀的美育思想是明确的,他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音乐文化建设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小学音乐教育又是关系到整个后代文化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的大事,决不能可有可无,等闲视之。”^{[16]293}再次,强调民族音乐,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1956年,贺绿汀发表了一篇《民族音乐问题》的文章,曾掀起了一阵风波,这一风波源自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音乐界的“国粹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是关于“中西音乐”“土洋之争”的,实际上的根源还是中国音乐落后的问题,故步自封的姿态无法去体验创新的意义,如居其宏谈到那段历史时所说,国粹主义们“没有看到时代发展和音乐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看到中国传统音乐远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民众心理的事实,没有看到在时代变革的大洪流中音乐变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17]18}。在今天看来,正是由于那些争鸣,才使得中国新音乐艺术具有了守正创新的进步动力,如贺绿汀在文章开篇所说,“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真理,发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确定我们应走的道路与工作的步骤”^{[12]174}。关于新中国的“民族音乐问题”依然有当年的影子,贺绿汀针砭时弊地指出现代中国社会不应该再有陈旧思想的固执,在面对发展问题时,更应该遵循艺术本有的规律。他敬重中国古代社会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同时也呼唤面对新的形势,无论中西地吸收先进的经验,他说:“我们学习西洋的目的是学习他们在音乐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参考他们的经验与规律来摸索

我们自己的规律,建设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音乐文化,发扬我们的民族音乐所特有的民族风格。”^{[12]181}他把在1953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室发展到1956年的民族音乐系,为民族音乐的人才建设奔走全国,也为搜集和保存民间音乐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本人也创作了《秀出河山一片春》和《森吉德玛》等大量的民族题材的作品。最后,贺绿汀特别重视人才的交流。他认为,提升新中国的专业音乐人才的视野和水平,最有效的方式是能够增长见识,建立博大的胸怀,历史上留法的萧友梅、留美的黄自和陶行知都是在国外接受先进的理念而回国效力的。到了1979年,贺绿汀还在重提“教育家蔡元培早有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初心,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我国的美育先驱们,缅怀黄自、陶行知,多次提到蔡元培、萧友梅,《在萧友梅博士逝世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和《陶先生的理想今天实现了》等文章中饱含着贺老的不忘初心。他经常引用《乐记》谈及艺术之美,也多次提到毛泽东、鲁迅、杜威和布鲁纳,以及肖邦的先进理念和优美之作。他行走全国和全世界各地,以战略性的眼光吸收先进的思想,怀有对祖国和人民深切之情,以上音为实践平台、以音协为理论阵地,为新中国的美育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贺老年近80还在笔耕不辍,相继写出了《怎样建设我国现代音乐文化》《谈谈音乐教育问题》《关于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建设问题》以及《为了中国的未来》,从1979年到1999年,进入耄耋之年的贺绿汀共发表155余篇文章,谈及与美育和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相关文章有50余篇,从他后期的相关文章中能够发现贺老对于社会音乐教育的深切关注。在对长春、贵阳、昆明、成都和重庆等几个城市的调研中,贺绿汀看到有些城市对于小学音乐课程的规划出现了问题,对于缩减和取消音乐课程,他指出:“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学生除了有数理化知识以外,还必须具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和艺术素养,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后代的精神文明素质”,他强调“要学校领导重视中小学音乐教育;改善音乐教学的工作条件;尊重音乐教师的劳动;关心音乐教师的专业进修”^{[15]226}。继而,对于提高和发展普通音乐教育,也曾说道:“中等师范学校是否可以普遍地开设艺术班?我曾经在一个中学办的艺术专修科念过两年书,兼学音乐与绘画,体会到学与不学大不相同……师范学院也应该设附属音乐中学和

附属小学。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出来的,应该是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编辑以及音乐管理人才。这样水平的毕业生到了中学后,立即可以开课……可以在工人新村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段设音乐中心,或称业余音乐学校,指派专业教师去辅导……青年宫、少年宫都可配备专门的教师,指导小孩学习钢琴、小提琴、木管、铜管、民乐、合唱。每年还可以组织音乐比赛,得奖的儿童可以输送到专业的音乐小学学习。”^{[16]235}

新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离不开贺绿汀的努力,在其为音乐教育事业贡献的一生中,并没有忘记美育与艺术教育的深刻关联,这是他立足 20 世纪伟大的音乐教育家的根本和其内心最初的美好愿景,他的所有举措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说蔡元培呼唤“美育”重返人间,那么贺绿汀则是“美育”在人间的缔造者,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有一批人奉献了毕生的经历,默默地做出了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美]理查德·加纳罗,特尔玛·阿特休勒. 艺术:让人成为人[M]. 舒予,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 4 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3] 陈聆群,洛秦. 萧友梅全集一卷·文论专著卷[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 [4] 萧友梅. 中国古代乐器考[A]. 廖辅叔,译. 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 萧友梅音乐文集[C].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5]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 8 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6]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 7 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7]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 6 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8] 洛琴,钱任平. 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1927—1941) [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 [9] 杨霜泉,栗仲侃,陆华柏. 贺绿汀老师 1932—1933 年在武昌艺专任教时的情况[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3).
- [10] 谢天吉. 黄自与贺绿汀之比较研究[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6(10).
- [11] 胡晓风,等. 陶行知教育文集(2 版)[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 [12] 《贺绿汀全集》编委会. 贺绿汀全集:第 4 卷[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 [13] 《贺绿汀全集》编委会. 贺绿汀全集:第 6 卷[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 [14] 姜瑞芝. 论贺绿汀[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15] 徐科锐. 贺绿汀与 20 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 [16] 《贺绿汀全集》编委会. 贺绿汀全集:第 5 卷[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 [17] 居其宏. 20 世纪中国音乐[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2.

To Achiev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Music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Cai Yuanpei, Xiao Youmei, and He Lvting

XU Ke-rui

(Jilin College of Arts, Changchun 13002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reflects the restructuring of both the histories of aesthetics and arts, as well as a process that aestheticians and artists concerning about the education made full use of available beneficial factors and structured both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manner regardless of Chinese or western cultures under the context of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The past like-minded people with respect to aesthetic education were dedicated to modern artistic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proceeding from innov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deas, establish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ystem planning of aesthetic educators' cultivation, and an earnest participation in aesthetic and artistic education practi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eeing the mass as paramount, He Lvting, the artist who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passed on the sediments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unremittingly spread thoughts of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arried out effective practice on aesthetic and artistic education with a mission of dedication to China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at has been fulfilled is a great aspiration to the caus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waday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Cai Yuanpei; Xiao Youmei; He Lvting; Art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秦卫波]

• 35 •